



2024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

□ 张晓涛

当前各大机构就全球经济增长给出了谨慎乐观的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当地时间10月22日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4年和2025年全球经济增速均为3.2%。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也在年末最新发布的《经济展望》中认为，尽管面临重大挑战，全球经济预计将保持韧性。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看来，全球经济正进入新的“低增速常态”。2024年，中国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全年GDP增长预计为5%左右，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约30%的份额。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愈发凸显，不仅是全球经济的关键增长极，也对全球贸易、投资、供应链、国际合作等方面起到重要的引擎作用。

外贸支撑全球经济复苏

作为全球价值链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贸易规模、增速、结构对其他国家产生重要影响。截至2023年中国已经连续7年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2024年，中国外贸稳中向好。海关总署官网近日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79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23.04万亿元，增长6.7%；进口16.75万亿元，增长2.4%。近年来，虽然受到供应链去风险化、新一轮国际产业链梯度转移等国际政治经济因素影响，我国产品外部需求发生一定程度转移，但“一带一路”建设、《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自由贸易协定的贸易效应明显，贸易伙伴更加多元化，从整体上对冲了不利影响。出口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迅速发展带来竞争新优势，贸易强国内生动力十足，我国外贸的活力与韧性推动全球贸易稳中向好。

中国在全球电子产品、机械设备、纺织品、家具、玩具等多个行业的出口占据主导地位。许多国家经济增长依赖中国的出口产品，尤其是关键的原材料、半成品和零部件。2024年中国在出口贸易中不仅继续保持传统的出口优势，还在向“智造”转型。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如5G设备、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技术等）的出口不断增加，成为全球科技创新和数字化转型的推动力。中国在绿色技术领域的创新，如太阳能电池、风电设备和电动汽车等产品的出口，也在推动全球能源结构的绿色转型。

中国市场发展稳中向好，资本品需求与消费需求潜力不断释放，对世界各国进口需求持续攀升。作为全球最大的进口国之一，中国通过进口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生产资料，不仅提高了国内制造业的生产力，也促进了全球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潜力逐渐被释放，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加突出。随着中国消费结构的升级，消费者对高端商品、奢侈品、优质食品和医疗健康产品的需求增加，从而促进了全球消费

品产业的发展，不但有利于增进人民福祉，也有利于世界经济复苏与国际协调，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动力。

对外投资拉动全球经济增长

安永发布的《2024年前三季度中国海外投资概览》显示，2024年前三季度，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1244亿美元，同比增长9%；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065亿美元，同比增长11%，其中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40亿美元，同比增长2%，占总体的23%。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呈现稳定的增长态势。202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1772.9亿美元，存量和流量均列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三位。从区域看，东盟、中东、中亚、欧洲等地凭借较大的市场发展潜力以及相对开放的政策，越来越受到中国投资者的重视和关注。从行业看，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能源基础设施类投资以及科技仍是较热门行业。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达1717亿美元，同比增长22%；完成营业额1099亿美元，同比增长1%。其中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新签合同工程合同额1430亿美元，同比增长23%，占总额的83%；完成营业额884亿美元，同比下降1%，占总额的80%。

自年度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发布以来，中国已连续12年位列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前三，对外投资大国地位日益稳固。虽然自2017年以来受外部需求收缩、中美经贸摩擦、乌克兰危机等因素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增速有所放缓，但在高质量发展政策指引下，我国OFDI规模保持平稳增长，中国企业加快出海步伐，以适应全球经贸格局的深度调整、全球经贸规则体系的变化以及充分利用我国高水平开放的制度红利，立足新发展格局建立更加富有韧性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出海企业投资更趋成熟，合规投入加大，抵御风险能力增强，战略韧性不断提高。

改革开放至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向国际舞台，致力于在海外市场拓展业务，以谋求更为持久和广泛的发展。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对外投资模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达1.68万亿美元；连续8年占全球份额超过一成，在投资所在国家（地区）累计缴纳各种税金5185亿美元，年均解决超过200万个就业岗位。

外资在国家（地区）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对东道国而

言，来自中国的投资可以为各类项目和企业提供必要的资金，推动经济的增长和发展；随着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引入，促进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中国企业投资能够为东道国增加就业机会，企业经营需要大量本地员工，不仅直接创造了就业岗位，还通过产业链的带动效应，间接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就业。中国企业投资有助于促进东道国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与投资相关的进出口活动能够增加国际贸易量，加强东道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联系，提升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流向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占比较高。一些发展中国家总体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处于工业化早期，起步艰难，国内资金相对有限，生产技术落后，产能不足，存在外汇和储备“双缺口”问题，中国企业的投资能够有效解决“双缺口”问题。同时也意味着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引进来”的经验、模式与智慧在异国他乡进行复制，有力促进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建设。

产业体系促进全球产业链升级

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中心的地位与优势依然稳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的升级和全球价值链重构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涵盖了从低端消费品到高端技术产品的广泛领域。当前，无论是劳动密集型商品、机电产品还是“新三样”均呈现较强竞争力。中国制造的产品不仅满足了全球市场需求，也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不断推动全球产业链向更高附加值方向发展。随着科技进步、市场需求变化和生产模式的转变，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供应链的攀升。

新业态发展助推全球经济转型升级。数字经济是中国对全球产业链布局影响最为显著的领域之一。随着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中国的电子商务、金融科技等领域迅速发展。例如，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数字平台不仅加速了全球商品的快速流通，也加速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数字化转型。绿色经济进一步推动了全球产业链的可持续发展转型。中国在绿色技术领域，特别是新能源、绿色建筑、绿色制造等方面的技术进步，不仅改变了传统能源的供应格局，还推动了全球产业链的绿色转型。例如，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在成为全球电动汽车产业链的中枢，

推动全球汽车产业的发展。

中国作为研发中心对全球产业布局产生重要影响。近年来，通过大量的研发投入、政策支持以及科技创新，中国核心技术的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成为全球重要的研发中心之一。随着中国在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航空航天等高新技术领域的不断突破，越来越多的全球企业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这不仅使得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发生深刻变化，也深刻影响了全球产业链的格局。国际合作中的技术溢出效应日益显现。中国的研发创新不仅推动了国内产业的转型升级，还通过区域技术合作、技术转让等方式拓展到全球。这些合作不仅推动合作伙伴国科技创新水平提升，还促使全球产业链在技术和生产要素配置方面实现优化重组。

制度型开放拓展全球经济发展空间

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提质升级，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世界新平台。中国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型开放，提升实现系统性改革成效和开放型经济质量。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抓手，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营商环境更优、辐射作用更强的对外开放新高地，提升我国竞争新优势的同时也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新动力和新机遇。

制造业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清零扩大国际投资规模。2024年，中国实现了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的全部“清零”，中国制造业市场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积极拥抱全球投资者。这一举措吸引了外资的大规模流入，不仅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也促进了全球制造业资源的优化配置。超大规模市场叠加制度型开放，完备产业体系叠加产业生态系统，持续优化和改进外商投资环境叠加经济发展韧性，我国持续成为外商投资兴业的沃土，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强大动力。

建立全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助力全球服务贸易发展。2024年，商务部发布《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年版），首次在全国范围对跨境服务贸易建立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明确了跨境服务贸易准入的“基准线”，实现了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新跨越。特别是在金融服务、教育服务、专业服务等多个关键领域，中国大幅放宽了外资准入限制。2024年，中国服务贸易继续快速增长，成为全球服务贸易增长的主

要引擎之一，为全球服务贸易的多元化与平衡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展现了中国在全球服务贸易体系中日益凸显的重要作用与影响力。

举办多场博览会，提供国际经贸交流合作平台。既有广交会、服贸会和进博会等成熟展会，也有消博会、链博会和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等新兴展会，覆盖传统国际贸易投资、消费、供应链、数字贸易等各个领域。这些展会能够有效促进上中下游衔接、大中小企业融通、产学研用协同、中外企业互动，帮助各国企业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大国担当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多极化发展

中国在经济和外交领域的广泛影响，促使全球治理体系逐步从单极化向多极化转变。中国通过参与和推动国际机制改革，加强了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平衡和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例如，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全球贸易规则制定、国际金融监管等领域，中国逐渐成为重要的决策力量。中国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全球性问题的共同解决，提出了更多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方案，推动全球经济发展走向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未来。

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当前全球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而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全球绿色发展方面承担着举足轻重的责任和角色。中国提出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已经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焦点。一方面，中国加大国内的环境保护力度，推动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和使用，为全球绿色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协议的谈判和实施，通过强化国内政策和国际合作，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积极推动建立区域多边和双边开放机制，促进全球高水平开放。中国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通过优化海关程序、降低关税壁垒等措施，显著提升了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实质性结束为中国和东盟共同建设超大规模市场提供了制度性保障，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能。中国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影响愈发广泛、成效愈发显著。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不仅加强了与共建国家的贸易与投资合作，还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增强了全球经济的互联互通。一方面，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充分凸显了投资引领合作并带动贸易发展的作用。通过鼓励更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助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实现资金、设施联通，加强共建国家内部与国际间的经贸往来，为中国经济发展开辟新空间，从而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通过加强重点产业的全球化布局，以及同其他经济体在产业链条上的分工合作，将共建国家纳入国际分工体系，使这些国家通过融入国际分工体系能够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从全球看，通过影响全球价值链体系调整以及资本等生产要素流动格局带来更为广泛的利益与福利。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对中亚、东南亚、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一方面，中国以负责任的大国担当，推动与发展中国家实现共同发展。中国通过合作平台的搭建与全球治理机制的重塑，与发展中国家在双边、多边和全球层面开展深入合作。蒙内铁路、印尼雅万高铁等重要项目建成运营，为共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贸易资金流动、人文交流畅通了渠道。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开创了中国—发展中国家关系新模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方案。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通过促进国家间互联互通及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程度，为全球贸易和投资增长创造了巨大发展机遇，平等互利的国际产能合作对发展中国家加速工业化进程、促进经济增长、维护社会和平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以“全球南方”主导成员国身份承担国际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展提供众多公共产品，积极发挥引领作用。6月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他再次强调了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中国积极支持非洲和“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自12月1日起，中国给予包括33个非洲国家在内的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成为实施这一举措的首个发展中大国。中国此举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发展需求，以实际行动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真正做到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各国人民。中国设立的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持续发挥作用，促进“全球南方”联合与共同发展，成为促进全球发展的重要力量。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



国际交流 新兴合作机制

□ 江琪

习近平总书记于12月2日在出席第四次“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重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建设”，“完善新兴领域国际交流合作机制”。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强调了新兴领域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宏伟蓝图中的重要地位，对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指引了前进方向。

新兴领域是随着科技的创新和应用及全球经济结构演变而出现的战略前沿技术领域，具有前沿性、交叉性、集成性、开放性以及风险性等特点。新兴领域涵盖海洋、太空、网络、生物、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生态系统。网络和人工智能是新兴领域的技术基础，海洋和太空是新兴领域技术应用的新疆域，生物技术和新能源是新兴领域国际交流合作与竞争的焦点。新兴领域为经济发展赋能增效，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为科技创新、科技与经济的协同发展、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体系的优化提供了坚实基础。随着新兴领域发展加速，科技领域的革命性突破在塑造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推动国家间力量对比演变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当前，世界各国正积极探索发挥和提高该领域发展整体效益的新战略、新技术、新手段，国际新兴领域呈现出蓬勃发展与激烈竞争并存的局面。一方面，众多国家通过国家战略和政策积极抢占新兴领域的发展先

机，如《美国政府关键和新兴技术国家标准战略：实施路线图》意在保持美国在关键新兴技术标准制定方面的持续战略和战术参与，《数字发展战略2024—2030》阐述了英国政府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实现数字化未来的计划，“法国2030”计划旨在通过经济脱碳、支持能源、数字技术、卫生等战略领域的发展加速法国的经济转型。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使国际分工体系加速演变、全球价值链深度重塑，各国在新兴领域的不断探索与创新为该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另一方面，随着国际格局的深刻调整，部分国家奉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在设置技术壁垒的同时加快了对中国的技术封锁，阻碍我国开展新兴领域国际交流合作。然而，全球化潮流和经济一体化趋势不可逆转，新兴领域国际交流合作为我国提供了突破困境、引领合作的环境与机遇。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进程中，新兴领域国际交流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在数字经济方面，我国积极打造“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平台，与10余个国家共同发布《“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北京倡议》，与30多个国家共同发布《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国际经贸合作框架倡议》。“中国—东盟信息港”、“数字化中欧班列”、中阿网上丝绸之路等数字丝绸之路重点项目全面推进，众多电商平台与共建国家建立深度合作；在人工智能领域，《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和《布莱奇利宣言》是中国与各国一起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

球文明倡议的具体行动。在推动建立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的基础上，中国与科研实力较强的国家联合开展科研项目、共享技术成果，推动智能安防、平安城市、智慧城市等应用在共建国家落地；在清洁能源领域，我国借助“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实施绿色丝路使者计划和“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等举措，助力共建国家能源结构优化。我国支持建设的埃及康翁波50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乌干达伊辛巴水电站项目、果刚（金）布桑加水电站项目等，既有助于缓解当地的能源短缺问题，又为促进共建国家绿色低碳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在生物医药方面，2023年，我国在“一带一路”市场中药类和西药类产品出口额分别为18.6亿美元和189.9亿美元。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与共建国家开展药物研发合作，不仅提供了质优价廉的药物资源，也带动了当地的就业和医疗医药产业发展水平的提升，促进了与共建国家的“心联通”。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我国与共建国家在新兴领域国际交流合作成果为我国带来诸多机遇。经济层面，在传统产业方面，新兴领域国际交流合作作为许多优势传统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传统产业+新技术”的赋能效应带动了相关产业出口，优化了我国的贸易结构；在新兴产业方面，新兴领域自身技术的聚合发展形成了相应的产业生态体系，推动了新兴产业的全链条蓬勃发展；技术创新层面，国际交流合作加

速了技术的扩散和更新，促进了国内国际资源的有效整合及多种技术、多种领域、多种学科的相互渗透，提升了我国在新兴领域的研发水平与创新能力。国际影响力层面，新兴领域国际交流合作带动共建国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发展，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生动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在国际社会，一系列国际公共产品的打造彰显了我国作为新兴领域创新推动者与国际合作引领者的担当，增强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

与此同时，需要认识到我国在新兴领域国际交流合作中还存在一定短板。其一，基础科学研究、关键共性技术、前沿新兴技术等领域的制约使我国新兴领域部分产业链关键环节的自主可控程度有待提高，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风险将影响我国与共建国家合作的深度与稳定性。其二，发达国家利用其先发优势占据了国际标准制定的先机，构建了相对封闭的、有利于自身技术的标准体系。由于在相关国际合作规则与标准制定方面的参与度不足，加之新技术标准化的门槛不断提高，使得我国在新兴领域国际规则中处于相对被动的位置。其三，新兴领域的蓬勃发展催生了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既懂新兴技术又熟悉国际商务与跨文化交流的人才短缺制约了国际合作项目的高效推进与拓展。

展望未来，完善新兴领域国际交流合作机制亟须多管齐下。在政策层面，需加强顶层设计与发展战略对接，制定更为精准、系统的新兴领域国际交流合作政策框架，强化部门间

的协同、政策制度衔接与资源信息共享，重点推进与共建国家新兴领域特色项目的合作，以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为突破口带动形成系统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的新兴领域国际交流合作网络。在合作模式上，充分发挥联合实验室、技术转移中心、海外科教中心、科技园区等科技创新合作的示范效应，鼓励企业、科研机构、高校等多主体深度参与，加强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双循环与资源联动，与共建国家构建与新兴领域发展相适应的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在风险防范方面，建立健全风险预警与应对机制，切实做好“走出去”前的风险综合评估，提前制定应对预案。不断完善风险防范内外协同机制，加强政企联动，共同探索建立境外项目风险的全天候联防联控综合服务体系。在国际规则与标准制定方面，积极融入国际标准化治理体系，主动发起新兴领域国际交流合作倡议与项目，提升我国在国际新兴领域治理中的贡献度和影响力。加快推进国内国际标准一体化进程，形成适应新兴技术的标准制定机制，统筹各模式下的标准化力量形成有效合力。

